

杜诗“伪苏注”与宋文化关系管窥

杨经华¹, 周裕锴²

(1. 贵州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, 贵阳 550004; 2.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, 成都 610064)

摘要: 在杜诗伪注中,“伪苏注”的影响最为广泛、危害最为巨大。它的产生,不仅与当时“夺胎换骨”、“点铁成金”的诗学理论密切相关,还与当时宋学的时代精神有关。宋学强调“断以己意”,高扬主体意识、淡化客观史实,造成了一种为证明“己意”而任意臆改史实、伪造典故之风。“伪苏注”在注杜过程中,托名东坡,杜撰历史,伪造出处,作为一种解释方式,不过是宋学精神的一种异化而已。

关键词: 杜诗;“伪苏注”;宋文化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0-5315(2010)04-0081-05

宋人伪托苏轼之名注释杜诗,刊为《东坡杜诗故事》,或云《东坡杜诗事实》等名,世称“伪苏注”。自“伪苏注”在南宋刊行以来,尽管历代学者对它的批判从未停息^①,然对“伪苏注”产生之深刻原因,学界却鲜有追究。上世纪末,莫砺锋曾撰文指出,伪苏注的出现绝非偶然,而是与宋人所奉行的诗学观念息息相关:第一,它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杜诗的基本态度,即对老杜之诗“无一字无来处”的普遍迷信,“伪苏注”正是对这一观念的印证;第二,“伪苏注”的出现还与黄庭坚“夺胎换骨”、“点铁成金”的诗学理论有密切联系,“伪苏注”用杜诗“点金成铁”伪造的拙劣典故造成了杜甫善于“点铁成金”的假象,迎合了当时诗坛的普遍风气^[1-2]。莫先生对“伪苏注”产生原因的分析诚然是深刻的,但惜其仅局限于诗学领域。笔者以为,要揭开“伪苏注”产生的真正原因,还必须深入当时整个宋学精神的内在本质。换言之,“伪苏注”之产生,绝不仅仅是一种诗学现象,同时还是一种在宋学精神影响下的一种文化现象。

一 “伪苏注”之“伪”

杜甫诗云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在杜甫看来,诗歌创作是知识与才学长期积淀的结果。而作为创作的样本,杜诗更是以“无一字无来处”著称,蕴含着巨大的知识含量。也正是由于杜诗中所蕴藏丰富的知识信息,在杜诗的注释中,考证典故史实,追溯语词出处,探究深沉寄托,成为历代注家追求的最高宗旨。

“伪苏注”饱受批判的原因不是因其伪托苏轼之名,而是其作注的态度极其恶劣。如果仅仅是伪托苏轼之名而实事求是地为杜诗作注的话,那么作为较早的宋注,它还是有功于整个杜诗学的。然而,“伪苏注”一个鲜明的特点,就是肆无忌惮地伪造典故。

“伪苏注”专注历代注家往往注不出来的生僻典故,给人以填补注释空白之感。是不是作伪者学识渊博,为他人无法企及呢?其实不然,这些难解的典故都是作伪者编造出来的。如《夏日李公见访》“墙头过浊醪”,诸本皆无注,而“伪苏注”注云:

苏曰:友人见陶侃,侃家贫无以致诚,其邻

收稿日期:2009-12-16

基金项目: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《宋代杜诗阐释学》(09YJC751014);贵州财经学院博士基金项目。

作者简介:杨经华(1975—),男,侗族,贵州三穗人,文学博士,贵州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;

周裕锴(1954—),男,四川双流人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人贤,谓侃曰:“子门有长者轩车,何不延之论当世事?”侃曰:“贫不能备醇饩。”邻人密于墙头度以浊酒只鸡,遂成终日之乐。宋朝王冀公过侃庙有诗云:“九重天阍梦搏翼,黄鸡白酒邻舍恩。”名公谓其诗中题。^{[3]卷二}

这个“典故”故事句句字字紧扣“墙头过浊醪”,乍看有根有据,但遍考《晋书·陶侃传》以及记载魏晋人物遗事的文献,全无此事。此外如《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》“自是君身有仙骨”引栖岩老人见孙登故事,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“焉得并州快剪刀,剪取吴松半江水”引索靖见顾恺之画山水故事,都是“羌无故实,向壁虚构”^{[4]644}。

为了使其注文可信,“伪苏注”注者伪造了他与苏轼在岭南亲受其教的史实。其序自云:“歌上书之明年,言狂意妄,圣天子不赐履襦,全生弃逐岭表,东坡先生亦谪昌化,幸忝门下青毡。”^{[5]前集,卷十}其注文中,作者遂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他追随苏轼在岭南的行迹,如:

《立春》:“菜传纤手送青丝”,苏曰:东晋李鄂立春日命芦菔、芹芽为菜盘馈贖,江淮人效之。古诗云:“芦菔白玉缕,生菜青丝盘。”予居惠州,适值春日,书示翟夫子。^{[3]卷二十七}

翟夫子即惠州翟逢亨,北宋秀才。事母至孝,博学多闻;居住白鹤峰,读书嘉祐寺,不求仕进。苏东坡贬居惠州期间与他有来往。北宋绍圣四年(1097)冬,苏东坡有《白鹤峰新居落成夜过西邻翟秀才》二首。诗中有“林行婆家初闭户,翟夫子处尚留关”之句,“伪苏注”即据此伪造其与翟夫子谈论杜诗的史实,造成他与苏轼交游的历史假象。

除此之外,“伪苏注”还伪造注文出处,杜撰子虚乌有文献,如《开元别记》、《三峰记》、《武党庙记》、《汉祖入关碑》等等,此不赘述。

总之,“伪苏注”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,任意想当然地为杜诗构造各种典故出处。朱熹说它是“反用杜诗见句,增减为文”^{[6]卷八四},陈振孙云其“随事造文,一一牵合”^{[7]卷十九},虽表述不一,但却道出了“伪苏注”的本质特征:即不必事事有据,但完全从自己主观理解出发,甚至根据句意虚构、杜撰史实出处。这种注释不仅无益于杜诗的理解,甚至将杜诗注释传统引入浮躁轻薄之歧途。

二 伪注背景:异化的宋学精神

“伪苏注”完全以自己意伪造各种典故、出处,固不可恕,然这种主观至上、忽视客观存在的精神实

质,在整个宋学精神传统中,却并非偶然。

宋人基于强有力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,对一切前人思想均不苟同。宋人的一切学术研究,能够取得创造性成就,乃在于他们不迷信古人,完全要“断以己意”,主张“自得”和“创造”。“自得”成为宋儒使用极为频繁的重要概念,如:

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,盖不自得也。为学治经最好,苟不自得,则尽治《五经》亦是空也。^{[8]卷一}

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:以身体之,以心验之,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,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,此盖某所为者如此。^{[9]卷三}

在宋儒看来,“自得”是源于主体内心世界的感悟,是实现创造的前提。李春青在谈到宋人的“自得”范畴时说:“‘自得’的主要意义是强调为学求道须返诸内心而无需旁索。在宋儒这里其意义则一是高扬独立意识与主体精神,二是倡导一种自由平和的精神境界。”^{[10][11]}苏轼评价王安石时云:“少学孔、孟,晚师瞿、聃,罔罗六艺之遗文,断以己意;糠粃百家之陈迹,作新斯人。”^{[11]第三十八卷}“断以己意”、“作新斯人”如果理解成褒语,恰好总结了宋学创造精神的两个方面:自得和创造。

宋学中的这种自得精神,迅速向诗学领域转移。王安石云:“孟子曰:‘君子欲其自得之也,自得之则居之安,居之安则资之深,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。’孟子之云尔,非直施于文而已,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。”^{[12]卷七十七}在王氏看来,这种张扬主体意识的“自得”精神,不仅是主体认知客观世界的前提,同样也是诗文创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宗旨。

在诗歌创作方面,这种“自得”则体现为以“己意入诗”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:“至东坡、山谷,始自出己意以为诗,唐人之风变矣。”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:“使事不为事使,荆公尝云:‘诗家病使事太多,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,如此乃是编事,虽工何益?若能自出己意,借事以相发明,变态错出,则用事虽多,亦何所妨?’”^{[13]卷七}宋人以己意入诗,不迷信古人,成就了宋诗的独特成就。

体现在学术方面,宋人的“断以己意”更是尤为明显。朱熹在谈到《诗经》研究时说:“唐初诸儒,为作疏义,因讹踵陋,百千万言,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。至于本朝,刘侍读(敞)、欧阳公(修)、王丞相(安石)、苏黄门(辙)、河南程氏、横渠张氏,始用己意,有所发明。”^{[6]卷七十六}宋人耻与古人同,事事出于

己意的理性精神,成为推动宋学走向颠峰的持久动力。然而,过于强调主体的自我体验与自我感悟,极端自信于自己的主观理解,必然导致对客观存在观念的淡薄。这种“断以己意”一旦走向极端,必然导致为了论证己意而不惜奴役史实,甚至走向伪造典故,臆造史实的反面。在宋人的各类著作中,伪造典故,臆造历史史实以证明“己意”的作法,并非偶然。石介《中国论》:

闻乃有巨人名曰佛,自西来入我中国,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,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,以其道易中国之道,以其俗易中国之俗,以其书易中国之书,……虽然,中国人犹未肯乐焉而从之也。^{[14]116-117}

老子乃中土之人,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尝载老聃西游之事,东汉由此衍化出《老子化胡经》之书。石介言老子“自胡来入我中国”,由“胡”而化“中国”,纯出于个人臆造。南宋黄震早就对此表示怀疑:“老子于传,则自中国西入胡,今云自胡入中国,亦未知何据也。”^{[15]卷四五}其实,石介伪造史实的目的,无外为挺立民族意识和崇儒意识,证明“中国之道”,虽有外道化之而终不改。

伪造典故,似乎成为了宋人的通病。即使是不打诳语的佛门中人,亦不例外。释契嵩在论证佛门亦重孝行时,亦引古云:

慧能始鬻薪以养其母。将从师,患无以为母储,殆欲为佣以取资。及还而其母已殁,慨不得以道见之,遂寺其家以善之,终亦归死于是也。故曰叶落归根,能公至人也。^{[16]三十六册,230}

慧能鬻薪以养母、归死其旧宅之事,不见《坛经》,此前亦未见任何文献提及,故纯为契嵩“出于己意”之伪托。契嵩以孝行为佛之本,自造禅门典故,实质上不过欲借六祖之名以钳众人之口。

在宋学精神的影响下,注释训诂之学难免不受冲击。王安石的文字训诂学本身就是宋学精神的产物。凡解不顾历史事实,纯出以“己意”附会。如其《字说》,一反班固、许慎等确立的“六书”原则,一概用“会意”的方法来分析字形,其荒唐之处,受到后世学者的嘲讽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批云:“字义固有可得而解者,如‘一而大谓之天’是诚妙矣,然不可强通者甚多。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‘波’,曰:‘水之皮。’坡曰:‘然则滑者,水之骨也。’”^{[17]卷十三}王安石一概以“会意”解字,如言“波”为“水之皮”,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臆测。其《字说》中附会之处甚多,此不一

一赘述^②。除《字说》之外,王氏的《周官新义》、《诗义》等更是如此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十九《周官新义》提要云:“安石之意,本以宋当积弱之后,欲济以富强,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,于是附会经义,以钳其口实,非真信周礼为可行。”^{[18]卷十九}论述可谓深中王氏注释训诂之学之肯綮。王氏《诗义》虽然已佚,但从今人丘汉生辑录的辑佚本看来,其牵强之处,仍复不少。如王氏对《豳风·七月》中“八月剥枣”中的“剥枣”解释为“剥其皮而进之,养老故也”^{[19]卷四十三}。这一解释与旧注“剥,扑击也”不同。后来王安石罢相闲居金陵,一次在山野间偶然听到农家童子称扑枣为剥枣,发现自己释义有误,于是上疏请求删去这条注释^{[20]卷十五}。“剥枣”与“养老”之关系,不外是王氏“自得”之说,如果不是在铁证如山的客观事实面前,王氏不可能如此从善如流。这里虽然反映了王氏从善而改的严谨学风,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在《诗义》的理解中所存在的无视文献依据,但凭“己意”附会以达主观目的的阐释倾向。

在这样如此强调“己意”,高扬主体意识、淡化客观史实的宋学时代背景之下,出现“伪苏注”之伪造典故与出处,有什么值得奇怪呢?此亦不过宋学精神之异化而已。

三 托苏之由:苏轼学风流弊所及

虽然“伪苏注”为他人伪托,与苏轼本人无关,然而,宋代杜诗伪注很多,据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及程千帆《杜诗伪书考》,宋人所为的伪注达十三种,为什么只有“伪苏注”那么肆无忌惮的伪造典故、出处,而且一定要托名苏轼呢?细考苏轼生平所为,这种伪造典故风气之盛行,实与苏轼本人密切相关。

苏轼凭借才气,率意伪造典故的行为,首见于其于嘉祐二年应礼部试的《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该文第二段云:

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。将杀人,皋陶曰:“杀之”,三。尧曰:“宥之”,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:“鯨可用。”尧曰:“不可!鯨方命圮族。”既而曰:“试之。”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从四岳之用鯨也?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《书》曰:“罪疑惟轻,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,宁失不经。”呜呼!尽之矣!^{[11]卷一}

文中杜撰关于“皋陶杀人”的典故,甚至瞒过了当时的一代宿儒欧阳修等人。按赵令畤《侯鯖录》载:“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,及入谢曰,引过诣两制幕

次,欧公问其出处,东坡笑曰:‘想当然尔。’数公大笑。”^{[21][129]}这个故事流传很广,据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八、陈善《扞虱新话》卷五、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八则载为梅尧臣与欧阳修文问及出处,苏轼答云“何须出处”,时人为之太息不已。总之,无论是“想当然”还是“何须出处”,都表明了此则典故完全是出于苏轼自己的杜撰,是纯粹“想当然”的结果。

苏轼不仅在文学创作中杜撰典故,其学术著作也无不沾染这种“想当然”的习气。尤其是他对杜诗的解读,更是进一步助长一种不重实据、凭空猜测的阐释之风。如他对历来众说纷纭的杜诗《八阵图》的解释即是一例:

仆尝梦见人,云是杜子美。谓仆曰:“世人多误解吾诗《八阵图》。诗云:‘江流石不转,遗恨失吞吴’,人皆以为先主武侯皆欲与关羽复仇,故恨其不能灭吴,非也。我本意谓吴蜀唇齿之国,不当相图,晋之所以能取蜀者,以蜀有吞吴之意,此为恨耳。”此理甚长,然子美死凡四百年,而犹不忘诗,区区自别其意,此真书生习气。^{[11]卷六七}

这段解释在杜诗注释史中非常著名,不是因为见解的别致,而是因为它“白昼见鬼”的托梦方式。“尽管苏轼声明这是杜甫本人托梦传达本意,然谁能保证这不是苏轼玩弄的‘以今准古’、以己意度诗意的把戏呢?即使我们相信苏轼所做的梦是真的,那也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的梦想而已。何况不同的读者会做不同的梦我们又凭什么确保这不是梦者的‘私意’而是杜甫的‘原意’呢?”^[22]

苏轼坚信自己的理解,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的情况下,造就了这样一个理想之梦。周裕锴指出:“正如苏轼这个故事所象征的那样,任何希望超越千百年之上的时空距离,身历其世,面接其人,而与作者的自我合而为一的理想,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梦。”^{[23][251]}任何人的理解都不可能超越时空限制而与诗人原意完全重合。伽达默尔说:“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本文。”^{[24][380]}任何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,都必然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,“那种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主观的体察而实现与作者原意的千年对接,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迷梦”^[22]。

苏轼正是一个非常善于用梦来表达情感、传递思想的人。他记梦或与梦有关的作品非常多。其《东坡志林》甚至辟有《梦寐》专类。其中“梦中论《左

传》”条更是体现了苏轼典型的托梦阐释手法。该条就《左传》对古诗《祈招》创作动机的分析进行讨论。《左传》认为,周穆王欲肆其心,周行天下,南北征讨,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以止之^{[25][134]}。苏轼在梦中托数人辩论,其中一人认为《祈招》虽然善讽,但未能感切穆王之心;另一人则分辨云:“以民力从王事,当如饮酒,适于饥饱之度而已;若过于醉饱,则民不堪命,王不获没矣。”^{[26][17]}明眼人一看便知,这不过苏轼借此表达自己的诗学观点而已。他对《祈招》的理解,与《八阵图》的手法显然是同出一辙。

以梦的形式来阐释作品,假如这个梦是真实的话,它反映了什么样的心理呢?根据西方精神分析学派佛洛伊德的观点:只有未能得到满足的人,才会富于幻想或多梦。佛洛伊德说:“梦的内容是在于愿望的达成,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。”^{[27][51]}由此看来,苏轼梦中托人之言,分明就是他自己内心思想的深层折射。其托梦之本质在于借梦来表达、满足自己强烈的主观理解与愿望。苏轼的托梦阐释与“伪苏注”之假托伪造在解释策略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分别。只不过“梦”本身是一种无法验证之物,而伪造的文献则易于查考验证。故“伪苏注”作者与苏轼相比,不过手段不同而已。

由于苏文善于随机生发,翻空出奇(甚至伪造典故),青年士子纷纷效之。按《老学庵笔记》载:“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,学者翕然从之,而蜀士尤盛。亦有语曰:‘苏文熟,吃羊肉;苏文生,吃菜羹。’”^{[28]卷八}宋室南渡之初,形成了一股崇尚苏轼文章的热潮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“伪苏注”之作者受苏轼文风的影响与启发亦在情理之中。

苏轼通过一个虚幻的梦来建构解释的合法性与权威性,不仅是一种极不严谨的作法,也同时对后世的杜诗解释史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洪业因此批判云:“王安石、苏轼之流,逞其聪明颖悟,不必皆有所据;世人慕其文采风流,摭拾为笔记诗话;后来注杜者更从引用,初未尝专为杜集著书也。”^{[29]序}洪业认为,苏轼等人“逞其聪明颖悟,不必皆有所据”的学术作风,对注杜风气的破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因此,“伪苏注”的产生尽管与苏轼本人无关,但这种假托伪造的习气的形成,苏轼显然难辞其咎。

综上所述,宋学之“断以己意”,重意不重实,即此数例,可窥一斑。而且对于苏轼等人编造证据,臆改史实之行为,宋人不但没有批判,反而传为佳话,连文坛盟主欧阳修亦赞其“善读书,善用书,他日文

章必独步天下”^{[30][129]}。在整个宋代,人们无不羡慕皇之伪造典故,时人亦不以为忤,那么末流加以仿效,进而变本加厉,亦势之所然。

注释:

- ①如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十一:“余观注《诗史》,是二曲李歌述。……必好事者伪撰以诳世,所谓李歌者,盖以诡名耳。”汪应辰《书少陵诗集正异》:“闽中所刻《东坡杜诗事实》者,不知何人假托。皆凿空撰造,无一语有来处。”(汪应辰《文定集》卷十)除此之外,朱熹、陈振孙等著名学者也对“伪苏注”予以批判。到了现代,程千帆先生《杜诗伪书考》、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、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,均从不同角度批判了“伪苏注”的妄诞。
- ②关于对王安石《字说》诸多例证荒唐可笑的批判,参见李文泽《王安石的文字训诂学——北宋新学学派之个案研究》,文载《宋代文化研究》第十三、十四辑(上)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莫砺锋. 杜诗“伪苏注”研究[J]. 文学遗产, 1999, (1).
- [2] 莫砺锋. 杜甫诗集演讲录[M].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
- [3] 黄希, 黄鹤. 补注杜诗[G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4] 周采泉. 杜集书录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.
- [5] 胡仔. 苕溪渔隐丛话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1.
- [6] 朱熹.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[G]. 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本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19.
- [7] 陈振孙. 直斋书录解题[G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8] 程颢. 程颐. 二程遗书[G]. 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9] 杨时. 龟山先生语录[G]. 《四部丛刊》续编本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34.
- [10] 李春青. 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[M]. 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1.
- [11] 苏轼. 苏轼文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
- [12] 王安石. 临川文集[G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13] 魏庆之. 诗人玉屑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78.
- [14] 石介. 徂徕石先生文集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.
- [15] 黄震. 黄氏日抄[G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16] 释契嵩. 孝行章第[G]//全宋文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6.
- [17] 罗大经. 鹤林玉露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18] 永瑤, 等. 四库全书总目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3.
- [19] 王安石. 王文公文集[G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7.
- [20] 洪迈. 容斋续笔[G]. 《四部丛刊》续编本. 上海: 商务印书馆, 1934.
- [21] 赵令畤. 侯鯖录[G]//曾枣庄. 苏文汇评.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0.
- [22] 杨经华. “伪苏注”何以托名苏轼[J]. 杜甫研究学刊, 2008, (3).
- [23] 周裕锴.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3.
- [24] 伽达默尔. 真理与方法[M]. 洪汉鼎译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99.
- [25] 杨伯峻. 春秋左传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0.
- [26] 苏轼. 东坡志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1.
- [27] 佛洛伊德. 梦的解析[M]. 北京: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, 1986.
- [28] 陆游. 老学庵笔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9.
- [29] 洪业. 杜诗引得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3.
- [30] 杨万里. 诚斋诗话[G]//曾枣庄. 苏文汇评.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0.

[责任编辑: 唐 普]